



一座城市就像一个人，如果没有独特的气度，也就不存在特有的灵魂魅力。长汀，这个与湘西凤凰一起被新西兰女作家路易·艾黎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两个山城，如果缺少了以坚韧的性格为底色的气度以及相关的印痕，就好像喜马拉雅山没有珠穆朗玛峰一样，会失去一种高耸入云的精神感觉。

长汀，当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地名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红军之乡。来到这座小山城时，向着那个时代遥望的时候，腾的一下，浑身涌腾着创作的欲望，原来它曾有1000多年的客家人首府的历史。

长汀旧时为汀州府首府，建城1200多年。其汉代置县，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建汀州，成为福建五大州之一。自盛唐到清末，长汀均为州、郡、路、府的治所。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大自然的眷顾与其坚韧性格的完美结合。

古汀州北接宁化，东临连城，南毗上杭，西南与武平接壤，西北与江西省瑞金县交界。大自然只为人提供了生存环境，而人类只有接受它、适应它、改造它。南宋绍定五年，也就是公元1232年，在长汀任县令的宋慈带领长汀百姓开辟航道，把原来由福州起运耗时长久的海盐，改由潮州起运。“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

就这样，汀州客家人借助汀江这条水上大通道，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迁徙广东的大潮流。依凭闽赣山区丰富的特产，挑山闯海，面向海洋、走向世界。汀江，这条哺育了祖祖辈辈客家人的母亲河，像一条带着慈母体温、散发着母亲温柔气息的长长背

红军之乡的气度

□ 顾伯冲

带，紧紧维系着汀州祖地与五洲客家游子割不断的亲情。

不断的战乱迁徙，全新的谋生环境，“衣衫褴褛、以启山林”，造就了客家人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品性。清代诗人、外交家、戊戌变法参与者黄遵宪在《乙亥杂诗》中有吟：“华路挑孤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这是对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由衷的点赞。

沿着悠悠汀江，听着潺潺水声，在青砖古道上试图探寻年轮的轨迹，纵览古汀州悠长的岁月历程，感觉自己又涅槃了一回。

上个世纪30年代，长汀作为客家人首府的韵味慢慢淡去的时候，突然又迸发出异彩，以福建苏区首府成为全世界目光的焦点。

从红军第一次换装，到第一批军需民用企业，从红军第一个军团建制，到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赋予了长汀诸多彪炳史册的第一。当年，瑞金是中央苏区的行政中心，而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这些，无不增强了这座小山城性格中的韧度。

长征路上最悲壮、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由包括长汀人在内的闽西子



弟兵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断后任务，走在队伍最后。他们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和大部队过湘江，以一师兵力阻击数倍敌人的疯狂进攻，全师6000多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这段历史如今被制作成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

1934年春天，福建长汀县青年钟奋然和妻子赖二妹结婚的第二天，便响应“扩红”号召，报名参加了红军。临别前，阿妹前来为丈夫送行，并承诺会按照客家人的风俗，每年为阿根做一件衣服和一双鞋子，等着丈夫阿根平安归来。阿根也向阿妹保证，等胜利后一定回来为她补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这就是当时他们朴

实的初心。

转眼30年过去了，痴情的阿妹等来的却是阿根的烈士证书。但是，痴情的赖二妹每天都会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向远方眺望。一望又是30年，直至老人去世。

这就是长汀人，这就是长汀的坚韧。

有人曾这样评论长汀：有历史的地方，纵使繁华落尽，依旧神韵不减。在长汀，我看到了这种性格代代相承的力量，这种气度与秉性，在改革开放后数十年间治理水土流失的久为功之中熠熠生辉。

早在上世纪40年代，长汀就与陕西长安、甘肃天水被列为全国三大水

土流失治理实验区。1940年12月，中国最早的水土保持机构——“福建省研究院土壤保肥试验区”在长汀河田设立，当时的民国政府试图治理长汀水土流失，但收效甚微。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坚持“滴水穿石、人一我十”的精神，坚持一张“绿图”绘到底，水土不治、山河不绿、绝不收兵。历届领导班子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换届不换方向、换人不换精神，带领全县上下持续奋斗，硬是用超强度的韧性，循着“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路线图迈进。

在长汀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关心、支持治理水土流失的足迹。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这无疑又一次吹响了长汀水土流失的治理集结号。

30多年来，长汀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62.8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98.8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986年的59.8%提高到现在的79.4%，植被覆盖率达由15%—35%提高到65%—91%，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



□ 吉炳伟

寒食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一般在清明节的前一天，这一天要禁火，从上到下只吃瓜果点心一类冷食，民间普遍认为寒食节起源于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的故事。

春秋时期，晋国发生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往国外，随行贤士多人，主要幕僚有5人，介子推是其中之一。介子推追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受尽磨难，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立为国君，介子推立下了汗马功劳。

重耳结束了19年的逃亡生涯后，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史称晋文公。当时由于政局不稳，“未尽行赏”“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对此，介子推没有抱怨，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主动请赏。介子推认为晋文公当上国君，实为天意，没必要得到奖赏，并以接受奖赏为耻辱。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写了一段介子推与母亲的对话，其母问：“亦求之，以死谁怨？”介子推说：“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其母理解介子推的志向，但还不死心，又说：“亦使知之，若何？”介子推回答说：“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看到介子推意已决，就说：“能如此乎？与女偕隐。”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介子推对晋文公的忠心耿耿，对势利小人的深恶痛绝，对功名利禄的鄙弃淡泊，也能感受到介子推母亲的高风亮节和深明大义。

介子推不肯受赏，《吕氏春秋·介立》记载其曾赋诗一首，“有龙于

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死于中野。”表达了介子推的无奈和心志。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作了引用，但有出入，说是介子推手下人写的。介子推的手下为打抱不平，夜里将这首诗挂到城门上。晋文公看到后，后悔自己忘恩负义，赶紧派人召介子推受封，才知道介子推已与母亲一起隐入绵山。晋文公求人切切，听小人之言，下令三面烧山。没料到大火烧了三天，介子推的影子也没出现，后来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骨，介子推抱树而亡。晋文公很是痛心，把整座绵山封给介子推，起名叫介山，并下令介子推忌日禁止烟火，仅食寒食，从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节日“寒食节”。清初汤若望历法改革以前，清明节定在寒食节两日之后；汤氏改革后，寒食节定在清明节之前一日。现代二十四节气的定法沿袭汤氏，因此寒食节就在清明节前一日。

介子推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在《左传》《史记》等史书的记载中，并没有介子推被焚山而死的情节。寒食节起源于纪念介子推这一说法，到两汉之交才有记载，见于东汉桓谭的《新论》。原原在《九章·惜往日》中有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竊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立枯”二字，按照东汉文学家王逸的注释，就是“抱树烧而死”的意思，这说明至少在当时，关于介子推被焚死的说法就已有之。另外，《庄子·盗跖篇》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这段话中，“焚死”的情节已经出现了。当然，有人怀疑《庄子·盗跖篇》是后人的伪作，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介立》有介子推“赋诗公门”和晋文公“悬赏寻人”的情节，说明在战国时代，民间已经开始流传介子推的故事了。

三月斂云，四月裂帛。又快到清明了，现在很多人知清明却不知寒食。寒食节和端午节一样，也是因纪念一个人而有的节日，这里显示了中国人的情义。寒食节又是阴晴不定的时候，乍暖还寒，也应了介子推的人生境遇。由此想起苏东坡的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

——观《人生第一次·进城》有感

□ 张丹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7年，9348万，这巨大的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在观看了最近热映的一档名为《人生第一次·进城》的人文纪录片后，对我来说，这锐减的数字一下子有了具体的指向，体悟了到底什么是“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脱贫攻坚路上的“摆渡人”

从西南边远山区曲靖到繁华都市上海，2200公里，这遥远的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大山里的乡亲怎么克服重重苦难，实现人生第一次进城，刘增雄就是这样一位“摆渡人”。

刘增雄，《人生第一次·进城》的主人公，云南省曲靖市驻上海劳务工作站站长，他常年工作在上海，搜集各种职业信息，寻找合适、可靠的就业机会。每3个月，他会将这些用工信息带回曲靖，然后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跑，告诉那里的乡亲。很多乡亲，从出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乡土社会，城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因此对于出外打工是颇为踌躇的。刘增雄要给他们做工作，算细账，鼓励他们走出大山。常年下乡动员乡亲们进城务工的刘增雄，心里十分清楚，农闲时节出去务工，是这些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有效办法。同时，他更清楚乡亲们的实际需求：没有几个人愿意支付来回奔波确认工作的成本，所以他要努力促成用工单位进行网络面试。

刘增雄给乡亲们详细讲解上海企业的情况，一句、一句地教老乡们如何进行远程面试。他很耐心，语速不快也不慢。这时“摆渡人”刘增雄像一个老师。老乡们通过面试了，他又像家长一样把他们带到上海。老乡们对人生第一次进城充满未知，刘增雄拿着喇叭，事无巨细地叮嘱：“见不到天的地方就不能抽烟，过马路一定要注意红绿灯……”

“没坐过火车的要注意，厕所的门推不开就说明里面有人，如果能够进去，进去了以后你们记得，要把门栓插过来，不然你们上个厕所有人进

来，就尴尬了。”

“车上的开水在车厢中间，开水免费，可以泡方便面。”

“火车来了，注意安全，上车的时候不要踩空了。”

刘增雄和老乡们一样都戴着一顶红帽子，他手里拿着喇叭，挥动着旗子。火车站的月台上，他一个一个地数着带出来的乡亲，……21、22、23、24、25。这时他又像一个带队的导游。

把老乡们顺利带到了上海，他会和用工企业细心叮咛，也会和老乡们说一句：有什么事情再联系。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如此这般，刘增雄就算实现了一次完整意义上的“摆渡”。

如何讲述真正的中国好故事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要重点宣传基层扶贫干部的典型事迹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

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一次·进城》将镜头对准了刘增雄这样一个基层扶贫干部，有些普通，但是我们看过之后，很难忘怀。截至第7集，这部纪录片及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7.3亿次，前7集（这部纪录片一共分为12集，《进城》是第7集）海内外全网播放量达2.05亿次，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离不开这样几个因素：首先，这部纪录片做到了小切口呈现大主题。镜头对准的大幅标语：脱贫攻坚，无疑是《进城》这一集的主题。但是整部片子展示的都是刘增雄这样一个基层扶贫干部的日常生活。钱穆先生讲过：中国文学之伟大有其内在的真实性，所教训我们的，全是最平常而最真实的。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这部片子能够打动观众的关键所在。人文纪录片反映的内容多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情感、意志、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以及某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所以较之其他类型的纪录片，人文纪录片就显得更能打动

人、感染人，也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刘增雄在上海呆了3个月，回到曲靖，在山里边老家跑了5天，只在家住了1晚。当他收拾行装准备再

次出发时，只有3岁的女儿因为舍不得爸爸，号啕大哭。这个多年不曾流泪、内敛的中年人，摘下了眼镜，默默抹了抹眼角滑下的泪水。他的女儿特别可爱，圆圆的脸蛋，圆圆的眼睛，两个冲天小辫儿，她那像豆子一样蹦出来的眼泪，每一滴都在敲击着观众的心扉。她的妈妈抱着她，一言不发，作为一个“摆渡人”的妻子，我觉得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情景。每次看到这一幕，我都会下意识按下暂停键，将这样一幅画面定格在那里。从9899万到551万，她们同样作出了贡献。

其次，讲述真正的中国好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是中国好故事：能表现中国当代社会深刻变化及其艰巨性、复杂性；能塑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形象；能表现出当今中国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能在现实境遇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和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心血，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无疑涌现出很多动人的中国好故事。《人生第一次·进城》中另一位主人公王银花，她在土地里辛苦了很多年，但家中依然不富裕。丈夫行动不便，孩子还小，她很愿跟着刘增雄去上海闯一闯。她说：“只要能挣钱，我都吃得苦。”但身边没有人支持。几经犹豫，王银花说：“我一定要出来试一试。”她文化程度不高，从未出过远门，要在上海找到立足之地，并不容易。来到上海的王银花进入了一家养老机构实习。面对全新的环境，慌张在所难免。为老人穿反了袜子，吃饭时无所适从，对上海话一窍不通……看着她有些没头没脑地忙碌，一个老奶奶也有些不忍，关心道：“你吃饭呀，你在干嘛呢？你吃好饭再做事情。”三天后，院长提问各位老人的姓名、病症，王银花答不出来。这个工作，对王银花来说，还是很难。但她说，她觉得自己能够学好。要知道，坚持远远比放弃困难，这就是坚持的珍贵之处。这些动人的细节，人物面对镜头时的勇敢，正像泉水是从泉眼里涌出来的一样，都是来自生活的率

深秋的长汀依然满目青翠。扶亭栏望去，汀江澄净美丽，那种千丝万缕的脉络，延伸在江边飘拂的垂柳间，流淌在晚霞烘托的扁舟中，融会到深秋铺路的黄叶里。徜徉在长汀山水长廊间，宋朝女词人李清照描写秋景的佳句不由涌上心头：

“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汀江的水清凌凌慢悠悠，像一幅烟雨朦胧的水墨画，更像长汀人坚韧淡定的性格。它历经了沧海桑田，见惯了白云苍狗。

置身于汀江之畔的古城墙上，一种美感涌上心头，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在自然中，分不清我是自然还是自然是我，脑际里条件反射般地跳出了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中这样几句吟得那样贴切，又是那样自然：“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城市的气度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它将是永恒的。千百年来，多少宫殿倒塌了，多少帝国崩溃了，多少曾经繁荣的经济消失了，唯有这种气度会上接天际彩虹，下引地上之清泉，永存于天地之间。



真之“音”，这样的中国好故事才会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赞誉。镜头里的所有人物，他们都非常有勇气、有生命力。我们见证了他们战胜种种困难的全过程，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所做的扎扎实实的努力。我们还可以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当下的生活，我们是否像他们一样拼尽了全力。

再次，艺术化地传递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钱钟书先生讲：“东海西海，心里攸同”，东西方文化虽有不同，但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其心理指向常常是相同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文艺创作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回归到人性，从人性出发，找到人类内心深处共同的情感。刘增雄这样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承载的是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这样的大主题、正能量。但是正能量不是一定要“宏大叙事”，大的题材不容易驾驭，在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中，我们能找到很多温暖的、积极的东西。《人生第一次·进城》以刘增雄在上海出租屋里打电话为老乡联系工作的画面开始，最后以王银花手机镜头里璀璨的上海外滩结束。这是刘增雄一次“摆渡”的结束，也是下一次循环的开始。当克服了重重困难第一次来到上海的王银花，把手机的镜头对准了灯火辉煌的外滩，手机的另一边，那个只有5岁，却能够熟练地帮妈妈操持家务的叫桂欣润的女孩儿，欢欣鼓舞地大声喊着：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相信她会记住上海这个城市。拍好一部片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究技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要有机地结合。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最终还是要表现出普通人的顺境与逆境、拼搏与坚持、梦想和期望。只有这样，才能拍出有高度、有温度、有力度的作品，从而赢得国内外观众的共同认可。

